

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与效率

袁富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2488)

摘要:中国经济以结构性减速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工业化规模效率模式的终结;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加速,为现代化提出了诸如增长非连续、效率补偿等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也意味着经济效率模式的重塑。

关键词:现代化;效率;转型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8)03-0071-09

经济现代化在世界经济史上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模式。即使仅仅对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行观察,我们也可看到诸如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之类的划分。作为现代化后起之秀的中国,不仅以巨大的经济体量引起世人瞩目,而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独特探索,给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步入持续快速的增长轨道,顺利实现了重化工业化。2012 年以来,随着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发生和新常态时代的开启,持续 30 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结束。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程度的升级,以及粗放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升级。围绕结构性减速、增长非连续和效率补偿三个命题,本文从长期增长和发展转型的角度,尝试着揭示中国向高级现代化提升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和跨越路径,并以此论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和实质:理论逻辑

社会科学中对于现代化这一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从古典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滕尼斯、涂尔干以及韦伯——对现代化历史内涵的研究,到 20 世纪晚期以吉登斯为代表的当代社会学家对高级现代化和全球化特征的考察,已经建立起对于现代化内涵和实质的深刻认识^[1]。对此,陈柳钦^[2]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综述,并从发展的视角把现代化界定为“一种特定的发展水平的体现”,即向着世界先进水平迈进。这种理解下的现代化路径,体现为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及工业社会向信息社

会转变,因此,现代化的内涵可以综括为:现代化发展能力,现代化质量水平和现代化公平水平。总体来看,这种认识触及到了经济现代化的结构和要素的一些本质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本文以这种界定为起点,结合我们对于产业雁阵理论的拓展,引申出现代化和效率模式生成的理论逻辑。

(一)产业发展的雁阵理论与现代化路径

动员和培育发展潜力——特别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达成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传统发展理论的主要关注点。根据 Rostow^[3]增长五阶段思想,工业化起飞是现代化与传统社会的分水岭。在起飞直至工业化成熟的这个时期,现代部门扩张与储蓄和资本积累之间的良性循环,推动着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的交替发展,直至把经济推升到大众消费阶段,并导致城市化过程中生活质量和福利目标的建立,亦即对工业化时期技术中心主义的替代。

1. 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和理想的工业化雁阵路径。现代化的阶段性演进思想,体现为工业化产业雁阵模型。根据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假设,工业化后发国家经济追赶的潜力,蕴含在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当中,如果先进的国外技术得以有效利用,则差距越大追赶速度越快。当然,这种假设的实现,取决于经济追赶国家自身比较优势的良好开发,国际分工互补理论对此提供了一种清晰的阐释。根据小岛清的对外贸易理论^[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经由资本、技术的国际流动和产业雁传递建立起来。首先,受到国内供求结构变动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处于边际的劳动密集型产

收稿日期:2018-04-10

作者简介:袁富华,男,山东成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经济学博士。

业,可以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后发国家,这种做法的有利之处,不仅在于帮助落后国家建立起现代工业化的技术基础,而且通过把比较劣势产业移出的“清理房间”的方式,使得发达国家边际产业的价值得到回收和再利用,从而进一步培育现代化动力。其次,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边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国外技术和市场,另一面有助于国内剩余劳动力向储蓄和资本积累转化,为工业化起飞和快速发展做准备。现实中,这种理论比较契合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工业化雁阵模式。

理想条件下,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即工业化起飞到大规模工业化推进直至成熟,是持续的“结构性加速”和朝向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的时期。在这阶段,工业内部出现技术和产品持续更新换代的梯度上升,也就是 Ozawa^[9]所谓的工业结构的雁阵升级。按照理想进程,首先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个简单阶段为发端,创造工业化起飞的基础和条件;然后依次进入重化工规模驱动阶段、零部件密集装配驱动阶段和知识信息驱动阶段。其中,简单阶段到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化阶段的演进,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一些追赶国家如拉美,在其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没能很好地实现突破;而重化工业化阶段到知识和创新密集的深加工度化阶段,也同样充满不确定性。现阶段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就是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2. 理论拓展。根据国际发展经验,重化工业化所引起的大规模工业化接近尾声的时候,往往是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的过渡和转型时期。此时,以经济结构服务化和城市化为主导的新动力,将逐渐取代以往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作为工业结构升级的知识和创新要素,越来越受到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状况的影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前期研究把工业化产业雁阵模式拓展到服务业,从而完成了产业意义上现代化全景的刻画^[6]。

我们对工业化向城市化和结构服务化持续演进的基本认识是,若假定产业结构沿着效率改进的路径优化调整,那么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将必然提供某些促进内生增长的要素和机制。换句话说,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现代服务的发展,必定是以知识和创新机制的提供为前提。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研究者认为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巨大生产力之上的,教育、研发、休闲等服务行业是现代经济的典型标志。

(二)经济现代化的两个阶段

立足于上述理想的产业雁阵演进模式,可以把工业化经济起飞之后的现代化路径分成两段。当然,这种分段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纯粹为了分析方便而进行的人为区分。前期研究中,我们反复申明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的城市化,是不同于工业化阶段的新的生产函数。大规模工业化——按照 Rostow 的说法——从经济起飞到工业化成熟这个时期,是围绕生产供给来组织的,规模效率及相应“供给—成本”增长路径是其典型特征。而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结构服务化,转向了以消费多样化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因此,从现代化角度来看,把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当成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建设阶段,自然有其合理性了。于是,对现代化逻辑的更加具体的理解可以表述如下:

1. 生产供给主导作为现代化的第一次突破。传统发展理论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是经由工业化的发展,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飞跃,大规模工业化的成果集中体现为“贫困陷阱”的突破,以及中等收入水平的达成。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是现代化物质基础的积累阶段,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本的积累和物质产品稀缺性的解决。

以生产供给为中心是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对于经济追赶国家而言,有三种要素为储蓄形成和资本积累提供条件,这些结构性条件包括:(1)过剩劳动力资源的使用和人口红利窗口的开启。这主要是就工业化起飞的初始条件而言的,“贫困陷阱”的存在和不连续增长,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工业化的起飞和推进,主要通过将农业部门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储蓄和资本积累。(2)工业化过程的良性循环的达成,得益于剩余劳动力使用及其与投资的相互推动,并促使现代部门不断扩大。(3)现有先进技术的可获得性,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外部条件。这个条件通常表现为经济追赶国家“干中学”机制,即通过技术模仿,巩固工业化基础。这三种力量持续作用到工业化成熟时期,将把经济推向中等收入水平。

2. 服务业和消费主导作为现代化的第二次突破。大规模工业化结束直至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按照国际经验比较,通常伴随着“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演进趋势,即所谓经济的二次转型^[7]。与第一次突破类似,这个阶段也需要门槛跨越,但是增长路径和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发生了变化,突破的动力也相应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具体说来,以城市化和结构服务化为典型特征的第二次突破,改变了工业化阶段以“生产供给为中心”的态势,转变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而这个新中心的建立,是发生在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新的经济环境之下。这也是 Rostow 所谓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引导的经济增长阶段。

(三)三个理论命题

上述关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分阶段描述,蕴含着产业雁阵升级和向发达水平演替的一些重要机制,可以用三个主要命题概括^[8]:

1. 结构性减速。作为贯穿于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经济趋势,资本驱动的大规模工业化成为结构性加速的大背景,这种趋势以传统/现代部门二元化的终结为标志。一旦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结束,城市化的发展将开启结构性减速的通道,原有规模效率模式被质量和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取代。

2. 增长非连续。与城市化相伴随的结构性减速过程,也是一个充满路径分化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后发工业化国家只有极少数实现了中等收入水平的跨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能迈进重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演进的门槛,增长非连续因此出现,迫使经济进入城市化过程的长期调整和震荡,表现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3. 服务业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效率补偿。增长非连续问题的出现,主要归因于追赶国家在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和规模效率消失之后,没能及时建立起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效率补偿机制,经济陷入单纯依赖投资或消费拉动的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与发达国家城市化阶段“高劳动生产率—高资本深化能力—高消费能力”良性循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由此,我们论及本文的主题——现代化与效率模式的重塑机制。下文将结合这种理想雁阵模式的运作机制,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发展取向给出分析,这必然涉及到对中国现有增长模式的偏离状况、以及如何将这种偏离拉回到理想增长路径的反思。

二、现代化经济基础的建设和工业化规模效率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过程和新时代现代化表述的本质

增长阶段理论把中国工业化起飞开始时间定位在 1950 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工业化目标。但是,受到特定历史时期

国内外不利发展环境的冲击,直至 1970 年代,工业化起飞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增长路径之上。改革开放为工业化的推进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条件,现代化建设和构想逐步具有了坚实基础。依据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到 2050 年,我国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随着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成效越来越显著,现代化战略和未来蓝图也变得更加清晰。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建党百年即 2021 年之际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百年即 2049 年之际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现代化新征程分两阶段推进: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九大报告关于经济现代化的构想,是在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城市化引领增长的新形势下形成的,即报告指出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困难提出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常态下经济结构条件发生了变化,导致原有规模效率路径不可持续。

(二)大规模工业化奠定了现代化的坚实经济基础

以生产供给为中心的快速的工业化规模扩张,贯穿了 1978-2011 年这个历史时期。其间,中国 GDP 增长速度维持了年均 10% 的超高水平,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比重迅速扩大,产业结构现代化步伐加快,通过模仿的技术进步向国际前沿快速收敛,属于典型的“结构性加速”,实现了贫困陷阱跨越和中等收入水平达成的第一次现代化突破。这个产品生产供给主导的阶段,实际上是为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高级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的阶段。从生产方式看,结构性加速过程的超高增长必须依赖资本积累和要素驱动,粗放和规模是其典型特征,因此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也对应着规模效率的发展模式。这种规模效率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结构现代化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两类大的产业结构转变,提供了中国工业化超高速增长的动力。第一类是产业间的结构优化,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维持在46%的高位,增加值的再分配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农业部门增加值份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28%下降到2011年的1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则从24%上升到43%,至少在产出分布上,中国部分地具有了现代化的特点。第二类是工业内部的结构升级和雁阵升级,这是结构性加速时期规模效率创造的核心。从轻重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重工业产值比重约50%,1990年代末期开始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并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2011年达到70%以上。比这种比重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轻工业到重化工业化阶段的完成,以汽车、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知识密集型深加工程度化工业行业近年迅速发展。2012年以来中国工业统计口径的调整,轻重工业分类的不再使用,也标志着一个以重化工业化为核心推动力的超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同时,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国民经济效率快速提高。如1978-2011年间,第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为5.2%、8.6%和6.3%;1992-2011年间呈现更显著的结构性加速趋势,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6.0%、9.9%和6.7%。正如前文分析揭示的那样,这种效率的快速持续提高,主要来自于部门工业化过程中部门优化和规模扩张,因此带有典型的规模效率特征。

2. 资本形成。上述围绕工业部门结构升级展开的结构优化和规模效率提升,与所谓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有关。中国超高速增长时期的资本形成有着自己的特点或模式,总体来看,资本形成路径由两次大转变构成:即1990年代末期以前的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快速增长时期,以及其后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为动力的城市化时期。根据张平和张晓晶^[9]的分析,1998年以来,随着国家对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动,尤其是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消费信贷的启动,中国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也相应从原来单一的低价工业化推动,转为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双推动。从资本形成的结构看,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比重上升。同时,由于资本形成路径的这种分化,倾向于效率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导致持续至今的产出/资本比率下降。因此,总体来看,资本形成的这种路径依然属于规模效率的范畴,其绩效就是工

业和服务业产出的双加速,最终导致2011年资本形成率达48%这个历史峰值的出现。

3. 人口红利。前文关于产业的国际分工互补及产业的国际雁阵传递,有一个理论和历史背景,即1960年代之后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亚洲四小龙和中国顺次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分工梯队。中国以自己的劳动力资源禀赋进入全球化的最大的收获,是在很好地利用了过剩劳动力的同时,逐步带动了人口的城市化,并实现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升级(尽管仍存在很大问题和巨大开发空间)。

从人力资源的现代化角度看,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的劳动力再配置,在经历了第一次大的转变后,正在发生第二次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伴随着资本形成路径分化而来的劳动力产业间再配置以及劳动力向东部相对发达区域的流动。一个突出现象是,2003-2011年间农业部门每年的就业增量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负值,即使200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也没有导致劳动力向农业部门回流,这意味着就业份额较大的服务业部门,已经接替农业部门成为新的劳动力贮水池,在继续接受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入的条件下,第二、三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现象将越来越明显^[10]。第二次转变是正在发生于城市间的劳动力和人口再配置:大规模工业化引致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主要表现为农村工业化和人口就地转移的县域城市化路径,导致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大城市,城市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单个城市规模的增长而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力量。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城市化向着一、二线城市集中化发展,劳动力资源开始在城市间流动并导致未来的城市分化^[11]。

整体来看,中国劳动力的这种大规模流动和再配置,与资本驱动的经济规模扩张路径相一致。这种再配置本质上仍然属于剩余劳动力资源使用和人口红利开发的范畴,与工业化规模效率的规律一致,且对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结构性减速和规模效率递减问题

2012年以来的经济减速——从1978-2011年的平均10%下降至2012-2016年的平均7.3%,按照我们前期的界定^[12],属于结构性减速。之所以称为结构性减速,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和经济结构条件的变化,原有超高速增长的动力正在消失,表现在国民经济中工业部门的产出和就业,不

断被服务业的发展替代;即资本驱动和重化工业主导的增长,演化为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增长,结构性减速成为城市化过程的新常态。新常态的出现,使得工业化旧常态的一些问题凸显,而对这些问题的克服,正是效率模式重塑的核心。下面结合导致结构性减速的条件变化,对规模效率不可持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

1. 资本效率下降与效率失衡。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快速推进是在资本驱动之下进行的,当然,资本快速积累推动现代经济起飞直至工业化成熟,也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根据前文所述,2011年中国投资率达到48%的峰值后出现下降拐点,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资本积累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路径开始出现,我们的前期研究预期这种趋势将随着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而加剧。“倒U型”路径的出现,与资本积累导致的资本效率快速下降有关,在结构性加速时期,这种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中的调结构等措施,均与此有关。

从资本效率变化趋势看,根据我们的测算,随着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国民经济的产出/资本存量比率呈现快速下降趋势。1980年代为0.67,1990年代为0.56,2000-2011年为0.38;近年来下降至0.2左右。200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主要是投资倾向于效率相对较低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结果,这意味着原有粗放型投资方式的不可持续。与资本效率持续快速下降相伴随的,是产业部门的效率结构失衡,长期以来中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1/3~1/2倍。当然,这是由中国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决定的。问题在于,如果服务业效率不能得到改进,那么结构服务化的发展将会持续压低经济效率,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改善。

2. 低层次人力资本阻塞。资本积累的“倒U型”路径与劳动力供给的“倒U型”几乎同时发生。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绝对下降,预示着以往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方式的结束。当然,这不是中国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的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关键在于,在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并向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效率持续提升所必需的人力资本现代化程度不足——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中国经济向现代化高级阶段迈进中,正在遇到“中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问题^[13]。

表1 人力资本要素长期趋势:35-54岁
主要储蓄者高等教育比重:%

	日本	韩国	中国	泰国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1950	4.4	1.0		0.3	0.9	1.4	1.4
1960	6.0	1.8		0.5	1.2	1.4	3.0
1970	4.9	5.2		1.1	1.8	2.0	3.7
1980	12.6	9.1	2.2	2.1	4.2	4.1	6.2
1990	21.6	13.7	3.1	3.8	6.9	6.8	12.9
2000	32.4	24.9	5.2	5.0	8.3	13.4	13.2
2010	44.2	41.3	3.7	12.1	11.9	18.6	15.2
2015	47.3	51.9	4.5	14.6	12.4	19.3	15.1
2020	50.4	62.1	8.1	18.0	12.7	20.9	14.6
2025	49.8	71.4	8.0	18.8	10.9	22.3	14.4

原始数据来源:Barro-Lee.com.

表2 60岁以上退休人数与35-54岁主要储蓄者抚养比率

	日本	韩国	中国	泰国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1950	0.38	0.31		0.30	0.27	0.41	0.29
1960	0.41	0.30		0.30	0.31	0.46	0.36
1970	0.42	0.30		0.30	0.34	0.43	0.45
1980	0.46	0.30	0.40	0.31	0.36	0.37	0.53
1990	0.58	0.34	0.40	0.32	0.35	0.36	0.59
2000	0.84	0.40	0.38	0.35	0.35	0.36	0.60
2010	1.14	0.48	0.40	0.42	0.40	0.37	0.63
2015	0.96	0.53	0.47	0.42	0.41	0.36	0.56
2020	0.99	0.69	0.59	0.61	0.49	0.42	0.60
2025	1.06	0.87	0.74	0.73	0.57	0.48	0.62

原始数据来源:Barro-Lee.com.

表1和表2提供了中国、东亚、拉美国家35-54岁主要储蓄者中,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员的比重以及老龄化趋势。数据对比给出以下印象:(1)与日本韩国等成功实现经济跨越的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在向高级现代化升级的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员比重过低——现阶段主要储蓄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不到10%。表1还提供了未来几年高级人力资本的发展趋势,到2025年,日本韩国均超过50%,而中国受到人口规模庞大的制约,这个比重上升比较缓慢。(2)从发展趋势来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墨西哥,主要储蓄者中的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员比重,到2025年基本达到20%的水平。相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表现出高层次人才稀缺。(3)如表2,从60岁以上退休人数与35-54岁主要储蓄者比率看,中国表现出了快速的老龄化趋势。到2025年,日本、韩国的这个比率分别为1.06和0.87,中国为0.74,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问题是,不同于日本韩国,中国是在一个中等收入水平上呈现了快速的老龄化趋势,这种趋势对于人力资本升级和效率改进,都将构成很

大程度上的阻碍。

3. 全要素生产率(TFP)改进速度缓慢。根据增长核算方程,我们对TFP的测算结果表明:1985-1992年间,TFP增长速度为3.1%,TFP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为22%;1993-1999年,TFP年均增长3.9%,TFP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为36%;2000-2007年,TFP增长达到了4.2%,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39%;2008-2015年,TFP增长仅为1.8%,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1%^[4]。前文述及中国资本效率存在持续下降趋势,这是资本驱动的结果。同样,正是由于资本增长带动的高速工业化,在增长核算方程中,这就相当于挤压了TFP改进及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空间。

也可以说,TFP贡献份额相对较低,是经济追赶过程中模仿型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是,TFP在近年来的持续下降趋势,在结构性减速的新常态下,与增长质量提高的要求不相符合。随着服务业替代工业成为增长的主导力量,投资对增长贡献的下降是必然的,相应地,与这种路径相关的“干中学”技术进步下降也是必然的。因此,需要内生的技术进步接替“干中学”技术进步路径,否则城市化阶段的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也就是说,城市化时期面临效率模式的重塑,这个问题涉及增长非连续和效率补偿这两个命题,由此引出下面将要论述的内容。

三、中国城市化阶段效率模式重塑的核心要素及其机制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种思想可以归结为两点,即针对中国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的要求,经济发展需要围绕生活质量提高和生产率提高这两个基本要点展开,这也是现代化高级阶段实现的要求。

根据前文的分析,在理想的雁阵升级路径中,以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城市化阶段,是立足于工业

化巨大生产力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结构继续向深加工度化和信息化升级,同时服务业在日益替代制造业的过程中,也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效率补偿,这实际上是生活质量提高和生产率提高的良性循环在产业协同上的体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城市化体现了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新旧生产函数转换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机遇的时期。

(一)增长非连续和城市化阶段增长分化风险

根据我们前期研究的定义,增长非连续是经济追赶国家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对理想线性雁阵升级路径的偏离,如当前讨论较多的所谓拉美中等收入陷阱。从现代化角度来看,增长非连续意味着向发达城市化阶段收敛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低效率增长风险。也就是说,在转型时期中,如果问题处理不好,服务业和消费主导——或者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将导致增长的长期停滞和震荡。

1. 发达国家经验。图1展示了二战后一些主要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对比,指标是各国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一定程度上,这个对比可以说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也为中国为什么如此关注发展风险提供佐证。(1)鉴于其巨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潜力——包括雄厚的技术基础、企业家精神的传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积累等,二战后法国、德国、意大利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实际上是(被战争这种偶发性事件)暂时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恢复,因此,这些老牌发达国家沿着理想线性产业升级路径,实现向发达经济水平的收敛,似乎是自然的事情,这里无须进行过多解释。(2)二战后,得益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分工模式,日本和韩国向高级现代化水平的升级和收敛,对于后发国家有着更多借鉴之处。这两个国家虽然也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资本驱动的大规模工业化,但是,与其他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同,它们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嵌入了自主创新的内核,并非只是简单的技术模仿。例如,日本学者一直认为,日本工业化走的是知识创新和积累的路子,工业化战略也是立足于培育国内技术基础,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技术输出,从而建立起东亚雁阵产业传递模式。换句话说,日本始终遵从着线性的现代化路径——即城市化建立在工业化巨大生产力之上,具有典型的高级现代化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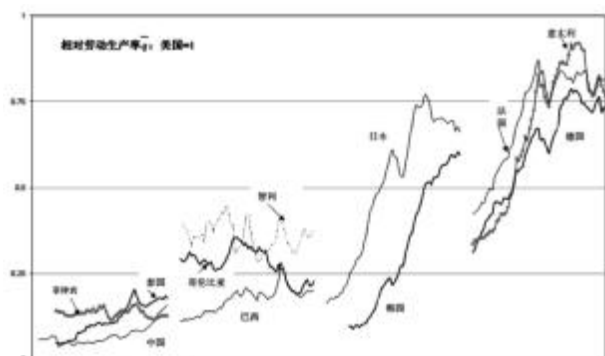


图1 1950-2011年各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路径:

美国劳动生产率=1

注:数据来源于PWT8.1数据库。

2.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图1也展示了拉美国家的长期震荡和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追赶情景,但是,不同于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之路,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不是建立在国内技术基础和知识创新的模式上,而是采用了资本和初级要素的驱动,因此普遍遇到了转型困难和现代化后劲不足的问题。(1)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作为对理想线性雁阵模式偏离及其城市化无效率发展的常用案例,拉美国家普遍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工业结构升级路径,国内资本积累能力和创新水平一直比较低。受制于土地集中、垄断等特定的制度依赖,无论是早期的出口导向还是二战后的进口替代及其后的宏观调整,这些国家似乎一直没有找到推动效率持续改善的有效路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属于超前型、早熟型,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巨大生产力之上,而是走的人口漂移路子,人口的过度集中进一步导致经济效率无法覆盖城市化成本,城市病因此发生。在其城市化阶段,尽管消费和服务业的比重较大,但是只是表现在数量和比重上,没有出现对效率提升至关重要的消费结构和服务业结构升级,因此,几乎看不到这些主导因素对国民经济的效率补偿效应。(2)中国和泰国转型面临的问题和对理想线性雁阵升级梯度的偏离,表现出另外一种模式——即资本驱动惯性和资本效率下降。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已经在前文做过分析,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就像单纯依赖消费会导致无效率增长那样,单纯依赖资本同样导致无效率增长。投资/消费的协同以及相应服务业/工业发展协同,是扭转偏离进而达成效率模式重塑的必由之路。

(二)效率补偿机制及其向理想增长路径的回归

对于经济追赶国家而言,效率模式重塑的关键,在于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经济良性循环机制的

构建——即前文所述“高劳动生产率—高资本深化能力—高消费能力”循环的构建。这就是所谓高级现代化的稳定的效率三角模式。如果以此为参照,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偏离问题,那么,下面的强调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了:即在工业化向更高级的现代城市化演进过程中,消费提高能力、资本深化能力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知识创造能力,对于增长跨越至关重要。直观来说,三种能力的培育,也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所谓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效率补偿机制,本质上就是针对重建这一稳定的效率而言的。无论是拉美国家的消费主导的增长,还是东亚发展中国家普遍表现的资本驱动的增长,均存在效率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面临增长模式的系统性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提高效率能力的培育。实际上,在转型经济中,服务业和消费主导或经济结构服务化,不能简单理解为服务业部门比重的增加和消费比重的增加,而应该从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这个角度,来论证高级现代化的达成路径。

1. 效率诱致机制的变化和结构条件的变化。借用赫希曼的术语,我们可以把经济向发达城市化阶段的升级,看成经济诱致机制的变动使然(Hirschman, 1978)^[5]。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的雁阵模式的建立,是沿着从劳动密集、重化工、深加工程度等结构变迁的诱致机制展开的。换句话说,它是基于工业部门越来越强大的前后向关联——尤其是后向关联——推动的规模效率的提升。但是,随着结构服务化的形成,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后发国家,原有工业化诱致机制由于服务业部门的替代而逐渐失去,而代之以新的增长动力。正是从这种诱致机制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城市化不同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正如前文揭示的那样,从以前以商品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转换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诱致机制在城市化阶段,只是保留在份额相对较小的工业化部门,以及工业/服务业的协同机制中。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和结构升级(如果有的话,就像发达国家那样),创造的主要不再是后向联系,而是作为增长的前提条件。如城市化科教文卫部门的发展和福利社会的建设。此时,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性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这也是区分现代化程度和现代化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2. 消费结构升级。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现代化过程,城市化阶段需要消费结构升级的支持,

主要是以科教文卫为代表的消费项目在总消费中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图2展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教文卫相关项目消费水平的对比状况。以美国为例,这些代表着消费结构高级化和现代化的比重,在近年来接近50%。作为沿着理想线性雁阵路径持续追赶的韩国来说,消费结构的现代化特征同样显著,近年来有突破30%的趋势。与此相比,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了,科教文卫项目消费比重长期处于20%以下,且似乎很难突破这个门槛。如拉美国家中比较具有发展潜力的墨西哥,消费结构一直处于传统消费品的主导之下,中国和泰国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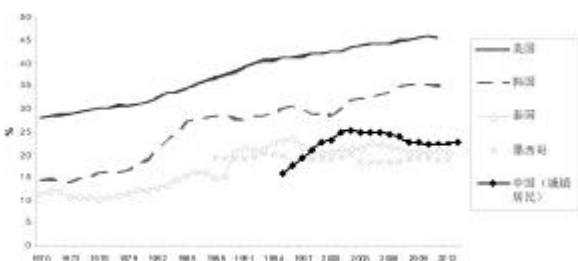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科教文卫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与各国的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UNdata。

消费结构的高级化和现代化之所以重要,是与现代城市化的效率补偿要求密切相关的。与工业化阶段——特别是“干中学”技术路径——不同的是,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知识过程的作用开始凸显出来,因为这是创新和内生技术进步的动力源。科教文卫相关的消费水平提高,本质上意味着包括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广义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也就是人力资本向高层次的梯度升级和提升。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发达国家把现代化高级形式作为知识过程的建设来看待,所以高层次人力资本积累和整体劳动力素质提高,自然成为像中国这样的准备实现现代化再跨越的国家的追求,以人民为中心这个表述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3. 工业与服务业的协同。消费结构向科教文卫项目的升级,不仅仅包括广义人力资本和知识过程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以知识过程的建立为核心,推动工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而言,这种协同牵扯到如何顺利实现重化工业化阶段向深加工度化的转型,以及服务业发展摆脱成本型的规模扩张进而转向效率补偿的良性循环路径。

知识过程作为起协同作用的嵌入机制,它对

“高劳动生产率—高资本深化能力—高消费能力”的稳定效率三角的塑造,以如下方式产生影响:第一,以科教文卫部门的发展为支撑,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并达成消费结构升级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促进。当然,教育和人力资本的高级化居于这个环节的起点,也是知识过程循环的起点。第二,溢出效应和部门联动。与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只是作为工业部门诱致机制的结果和被动分工地位——的处境不同,高级现代化中的结构服务化,以其在知识生产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而成为工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和积极的促进力量:即服务业结构的高端化或高级化,以及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和知识再生产的溢出效应。

(三)城市化、内部化与高级形式的现代化

针对转型时期中国工业部门诱致机制逐渐消失的趋势和新动力重塑的要求,有必要强调一下增长过程的内部化问题。鉴于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和工业化基础的薄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外部依赖和要素驱动的路子,这种发展方式导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费的长期压抑,通过消费增长实现发展成果向人力资本的转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受到忽视。换句话说,中国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缺少了增长内部化的环节,由此导致的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也成为高级现代化的障碍。特定意义上,十九大报告对人的发展的强调和对民生问题的重视,本质上是与城市化时期重视发展成果内部化相一致的,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的现代化观念,也标志着决策者对于高级现代化认识的深刻洞察。

四、结论

上面的分析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城市化过程的效率模式重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率问题,它不同于工业化阶段的“供给—成本”效率分析。从根本上说,中国正在开启的高级阶段的现代化,应当置于一个更加综合的视野中进行理解,称为社会的再平衡也好,称为社会态度的变化也好,都是立足于福利国家建设目标而进行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有鉴于此,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强调以下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措施:即平衡国家和市场的作用。

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中国工业化时期的政府干预,在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工业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仅体现于利率、汇率等市场和价格的管理调控,而且国有及其控股部门对于重化工业化的推进也功不可没。但是,当经济步入

城市化阶段,创新和企业精神成为普遍性要求时,以往那种推动规模效率的干预将在很多领域面临失灵的困境。原因是在知识和社会网络日益发达的城市化阶段,创新机会的利用需要企业家精神,同时,创新可能性的发现也是分散的,属于市场主体行为。

第二,国家的职能将更多集中于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支出方面。作为与市场同样重要的因素,国家在城市化时期的职能,主要体现为未来风险的预防和经济潜力的培育。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普遍经历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充分认识到了现代化的风险性特征,因此对社会安全也更加重视。他们根据未来风险预测制定预防措施,同时要求国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两个领域:一是社会安全网的构建。从战后至1980年,是这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如日本和韩国在完成工业化追赶之后,也开始注重社会保障的建设和完善。二是国家在经济环境稳定中的作用,主要是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价格稳定,这与现代城市化阶段居民财富的积累——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偏好有关。中国的新常态,实际上正在给政府在上述两方面的作用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

第三,注重市场和国家的平衡,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是由政府、企业和高校联合建立的开放性体系,主要是在充分利用国内外研发资源的基础上,建立国内技术基础,培育国家核心竞争力。与日本、韩国不同,中国工业化的成果更多是通过技术引进取得的,在自主的国内技术基础——实用技术和基础科学——的建设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十九大报告在这方面进行了强调,具体包括: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

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参考文献:

- [1] 帕特里克·贝尔特, 菲利普·席尔瓦. 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 陈柳钦. 现代化的内涵及其理论演进[J]. 经济研究参考, 2011(44).
- [3]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4] 小岛清. 对外贸易理论[M]. 周宝廉, 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 [5] Ozawa, T.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 [6] 袁富华, 张平. 雁阵理论的再评价与拓展: 转型时期中国结构问题的诠释[J]. 经济学动态, 2017(2).
- [7] 袁富华, 张平. 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理论分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6(2).
- [8] 袁富华, 张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实基础、理论逻辑、治理配套[J]. 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7(5).
- [9] 张平, 张晓晶.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J]. 经济研究, 2003(8).
- [10] 袁富华. 中国经济“结构双重性”问题分析[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4(3).
- [11] 付敏杰, 张平, 袁富华.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税体制演进: 事实、逻辑和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 2017(12).
- [12]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J]. 经济研究, 2012(11).
- [13] 袁富华, 张平, 陆明涛. 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结构: 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梯度升级问题[J]. 经济学动态, 2015(5).
- [14] 袁富华, 等.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15] Hirschman, A. 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W.W. Norton & Company, 1978.

[责任编辑 杨年保]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conomy: Mode and Efficiency

YUAN Fuhua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normal with structural growth slowdown marks the end of the original scale efficiency mod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based bring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such as discontinuous growth and efficiency compensation, which also means the reshaping of economic efficiency mode.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efficiency; transformation